

难。

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，从炎热的奥尔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（加缪在《鼠疫》中以帕纳卢作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）疗养，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，德军进占法国南方，加缪一时与家人音讯断绝，焦虑不安，孤单寂寞，这种切身的体会使他在《鼠疫》中描写新闻记者朗贝尔的处境时，特别逼真动人。

在加缪看来，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——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——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，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；他们在“鼠疫”城中，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，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。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，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“像老鼠一样”；在另一篇日记中，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：“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，可是仍然在期待……”

他的心中升起一种谦卑的热情去陈述这受罚的全过程，而这受罚却没有什麼特异之处，它只是人类存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而已。

人与命运之神的拉锯战在加缪的笔下被刻意地平淡化了，在鼠疫面前，与其说是里厄医生的妙手回春拯救了这座城市，不如说是鼠疫自身暂时的退却给了他们以喘息之机。小说的结尾，加缪以无情的口吻宣告了鼠疫如巨石般的循环性：“也许有朝一日，人们又遭厄运，或是再来一次教训；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，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。”

被鼠疫阴影笼罩的东方

鼠疫也曾肆虐中国大地。

作为蒙古大军所向披靡的“法宝”之一，擅长生物战的蒙古人，是人类史上最恐怖的幽灵军队，由于奉行游牧思维，习惯杀光征服地区的人口以将土地作为牧场，因此早在公元1211至1234年间攻灭金朝战争中，蒙古人就开始对中国北方的汉人和女真人实行了生物战。

当时，蒙古军队中流行黑死病，蒙古人沿袭游牧民族的古老战术，每攻占一个地方撤退时，就故意将腐烂或患病的人或牲畜的尸体投到河流和其他水源中；当遇到久攻

不下的城市时，就故意用抛石机将患病的尸体抛入敌方城中。

《金史·哀宗纪》记载，蒙古人在攻灭西夏国后，先是将党项人屠杀灭族。在1232年围攻金朝首都汴京（开封）的过程中，蒙古人又继续沿用生物战的套路，致使汴京城中在短短50天内“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人，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”。

1855年，云南发生了大型鼠疫，1894年在广东暴发，并传至香港，经过航海交通，最终散布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，估计在中国和印度便导致约1200万人死亡。

辛亥革命前期，在我国东北大地上就曾经暴发过一场规模空前的鼠疫，造成了巨量伤亡。1910年10月25日，两个皮毛贩子从俄国来到满洲里，投宿在一家叫作“魁生元”的小旅馆里。当天晚上，这两个人开始发高烧、剧烈地咳嗽，并大口大口地咯血，第二天人就死了，身上还布满了瘀斑。又过了两天，和他们同住一家客栈的另外两位旅客也病了，旅店老板不久后在客房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。不到两个月，这场瘟疫沿着中东铁路，经过海拉尔、齐齐哈尔，到大庆，到哈尔滨，到长春，再到奉天（今天的沈阳），朝着北京如野火燎原般地迅速蔓延开来。

最终，这种恶性传染疾病被确诊为鼠疫，1910年1920年由东北满洲里开始的这两次世界闻名的肺鼠疫大流行致死数万人。

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我国浙江、江西、湖南、哈尔滨等四省十二个市县区制造和使用惨无人道的鼠疫细菌武器，引起当地人及鼠间鼠疫连续流行十数年。



左图：欧洲黑死病绘画。